

#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生存论解读

徐诺舟

**摘要:**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经典论断并非表明恩格斯意图在生物学意义上破解人类起源之谜,而是旨在强调“劳动是创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基本要件”,其中蕴含了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生存论智慧。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在架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性功能,使人在与自然界的交互作用中生成并成就“人本身”。从这一意义上看,“人本身”不是介于猿与人之间的过渡性生物,而是富含自然性、类本质和社会性的劳动存在者。“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人创造了劳动”虽均以“人本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为共同根基,但在生存论的生命层面和生活层面存在根本差异。以劳动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确立外部世界的属人意义,进而确立属人世界在人的生存中的基础性地位,开显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生存论意义。

**关键词:** 生存论; 历史唯物主义; 劳动; 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 8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5)06-0010-10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作为贯穿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的枢纽性理论命题,蕴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智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命题在学界引发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sup>[1]</sup> 目前学界围绕“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思想意涵和当代价值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以下三大基础性问题仍存在争议。第一,该论断中的“劳动”是“专属于人的活动”还是“非人的动物活动”? 第二,该论断中的“人本身”指涉的是“正在生成中的人”还是“现实的人”? 第三,究竟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劳动”? 为此,必须回归《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的思想史语境,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理解“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生存论意蕴。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生存论路向,坚持“生活决定意识”的基本立场,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出发界定劳动的本质属性,并从人与自然的生存关联中把握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在超越生命“存活”意义的基础上,呈现人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生存论考辨,为研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从研究视角层面看,这种生存论思想打破了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解释原则,在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体验与生存状态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存”看作生活基础上与现实世界有机联系的历史性存在,注重追问“外部世界对人的意义或价值”<sup>[2]</sup>,并特别强调人的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生存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跳出“将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内在属性降格为一般生命存在物”的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研究”(2024JZDZ017)

**作者简介:** 徐诺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xunozhou@stu.pku.edu.cn (北京 100871)

还原论生存观念，建构了一个关切人的生存状态的理论阐释框架，将个体生存状态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基于此，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加以生存论分析，必须以生存论的“理论根基—基本视角—意义指向”为研究框架，从生存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出发，理解“劳动”的本质属性和外在形式；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出发，在人与自然的生成性关系中理解“人本身”的生存论意蕴；在人的生命存在与生活世界的相通性中理解“创造”意涵，证成“人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阐明生存论的意义指向。这既能够从理论上为破解学界的代表性论争提供全新阐释思路，也能够从现实上为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及新时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思想资源。

## 一、如何界定“劳动”：区分“劳动”的本质及形式

“如何理解该论断中‘劳动’的含义”这一基础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关于该论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代表性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该论断本身难以在逻辑上自洽<sup>[3]</sup>，而另一种观点则通过扩充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对此展开驳斥。在《作用》中，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sup>[4] (P555)</sup> 根据上述论述，质疑者认为恩格斯通过“属人的活动”和“制造工具”界定了劳动的内在规定性。质疑者还认为，恩格斯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中预设了一种类人猿的劳动状态，即猿也是具备劳动能力的，因为只有具备劳动能力的猿才能实现向人的进化。这种理解与恩格斯将劳动界定为“属人的活动”相悖。但对此加以反驳的一方指出，《作用》文本语境中的“劳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劳动在狭义上的确指向属人的活动，然而“恩格斯在文中所表述的‘劳动’并非狭义上的人类或人类社会特有的劳动，而是一种广义的非人类特有后天式的学习行为”<sup>[5]</sup>。论争围绕“劳动”究竟是否是“一种专属于人的活动”展开了探讨，但这两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脱离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作用》文本的思想史语境，未能明确论断本身的批判对象及其具体意涵。

回归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批判对象和理论基础，理解论断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是把握劳动本质特征的前提。在《作用》的开篇，恩格斯指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人类劳动的错误认识，即他们忽视自然对创造物质财富的现实意义，过分夸大了劳动本身的物质创造功能。鉴于此，恩格斯认为，人类劳动和自然界共同构成使用价值创造的泉源，“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sup>[4] (P550)</sup>。这表明，财富创造的本质是人类用内在的自然力量（劳动）影响和改造外在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同时，人类劳动并非只有创造财富这一种功能，“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4] (P550)</sup>。由此可见，“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批判对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功能理论，是基于“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这一理论提出的。

从批判对象看，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功能理论意在表明：不存在脱离一定自然条件而无中生有地“变”出财富的劳动活动，对“劳动”的理解和勘定必须立足自然条件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将劳动在本质上界定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反映的是主体和客体（他物）之间的一种“外化自我”与“内化他物”相统一的交互关系。恩格斯认为：“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sup>[4] (P558)</sup> 在此意义上，劳动的确可以在形式上划分为“动物式本能的劳动形式”和“自觉能动的劳动形式”。但劳动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意味着劳动主体赋予其自身活动以改造外部自然界的特性，这意味着劳动不是一种脱离客观现实而存在的抽象活动，而是在自然中进行的“中介性”活动。也就是说，劳动是劳动主体和外部自然之间互动的核心中介。在劳动过程中，相互关联着的劳动主体和外部自然界同为“中介性的存在”，劳动

主体只有通过自然的中介才能显现自身的潜在本质力量，而自然的存在只有通过劳动主体的中介才能显化。以劳动为中介，劳动主体与劳动对象实现了紧密结合，而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转化为劳动主体所需要的物质生存资料。在《作用》中，恩格斯对劳动的“中介性”意涵及其表现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手脚的分工为更好发挥劳动“中介性”功能创设有利条件，使攀树的猿群“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sup>[4] (P551)</sup>。第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sup>[4] (P555)</sup>，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是劳动中介性的集中表现，工具成为改造自然的“间接手段”。第三，劳动主体之间也存在着“中介性”关联。随着劳动的发展，在劳动主体之间生成的一种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sup>[4] (P553)</sup>的共同协作活动是劳动中介性的表现形式。正是以“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中介性’功能”为立论前提，制造工具才构成人猿揖别的基本标志，劳动也才成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并没有预设一种类人猿的劳动状态，也没有武断地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属人的活动。所以，对“劳动中介性”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全面、准确地把握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的本质，进而认识到劳动是一个涉及主体、客体以及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种考察，既反驳了从劳动主体视角出发，将劳动简单视为人所特有的活动这一片面观点；又规避了从劳动客体视角出发，以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方式割裂劳动基本内涵的问题。

从理论基础看，恩格斯立足于“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实质是厚植了该论断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sup>[6] (P531)</sup>因此，从生存论看，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观点，并非在生物学意义上探索人类的历史起源，因为这种对创造人类条件的考察预设了人类的非存在性。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当提出自然界和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问题时，这便是将人和自然界抽象化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sup>[6] (P196)</sup>进言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不是在传统知识论意义上追求人之起源的终极条件，而是在生存论意义上通过发掘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的中介性功能，寻求“人本身”在物质变换、社会交互活动中的生成性。在从猿到人转变的历史叙事中，一种具有成为“人”的可能性的存在物置身于维系其生命活动的世界之中，而尚在获得“人”之现实规定性的存在物也在与其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得以生成，即“在劳动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关系中，由于人是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劳动活动中生成的，因而逻辑上决定了先有劳动对自然界的改变，后有对人自身的完成”<sup>[7]</sup>。换言之，通过感性的对象性劳动活动，人之本性生存方式得以建构。人与自然同时在场并相互作用，在一种开放互成的生存境域中为塑造“人类生活”提供基础物质前提和保障。可见，该论断鲜明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即“人”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并成为“人”，而劳动便是呈现这种相互作用的“中介”。

通过考察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具体语境可以发现，“劳动”在生存论意义上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在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发挥着“中介性”功能。但与此同时，还需要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史，理解“对象性活动”与“劳动中介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对象性活动”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在将能动性吸收进来的同时仍然保持唯物主义的立场”<sup>[8]</sup>。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sup>[6] (P519)</sup>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sup>[4] (P38)</sup>人正是通过劳动才得以从自然之中分化而出，并通过劳动与自然界结成了感性对象性关系。因而，对

象性活动是主体将自身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对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劳动作为“中介”来实现。同时，“劳动的中介性”以对象性活动为前提，其存在意义就在于促成对象性活动。劳动本身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中介”，但如果没有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活动需求，劳动中介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见，在劳动主体与劳动对象、劳动主体之间的交互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劳动中介性”，是理解“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理论基础。换言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生存论意涵在于：当劳动作为确证人之“主体性力量”的一种“对象性活动”时，便已经成为证成人与世界之间生成性关系的“中介”。

## 二、“人本身”的根本指向：自然性、类特性、社会性的统一

解析“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人本身”的具体指涉对象，是理解该论断的第二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对于“人本身”的具体指涉对象，学界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人本身”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类，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本身”指向的是介于猿和人类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人本身’这种生命进化形态，既不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起点——‘攀树的猿群’，也不是过程的终端——‘完全形成的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生物’——‘正在生成中的人’”<sup>[9]</sup>“‘人本身’是劳动、语言、脑、意识发展程度较低，社会因素累积较不成熟的正在生成中的人”<sup>[10]</sup>。这两种观点必然会将“劳动”截然两分为“形成中的人的劳动”与“完全形成的人的劳动”。这种做法，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阉割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完整内容，既不符合恩格斯本意，亦未能解决质疑者的问题。动物以有限的自然存在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其生存方式呈现“既成式”特点；而有血有肉的人在劳动活动中以整个世界的无限存在物作为自己生存的对象，在人与世界的生成性关系中成为一种全面丰富性和自由开放性的“类存在物”，其生存方式呈现“生成式”特点。为此，必须回归于《作用》文本本身，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出发，着眼于人与世界的生成性关系，开解“人本身”的核心内涵。

在《作用》中，恩格斯着眼于“直立行走”“手的解放”“人的眼界的不断开阔”“语言的产生”“人脑的出现”“人类社会的产生”等关键性要素，揭示出从“攀树的猿群”发展到“正在生成中的人”最后迈向“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变迁史，强调“人本身”是富含自然属性、类本质和社会性整体意蕴的劳动存在者。从“直立行走”到“人类社会”，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对象的能力不断提升，并经历“服从对象”“控制对象”“与对象共生”的阶段性发展，逐渐达成人与对象的内在统一。人在对象中获得自我建构、自我陶冶，以时间性、历史性的样态发展自身。其中，个体的自我发展表现为人类从单纯的自然存在物，演变为具有丰富意涵的社会存在物，并意识到自我作为主体具有能动的生命表现性。

首先，“人本身”表明劳动的具体创造对象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在《作用》中，恩格斯强调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人的自然规定性，即“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4] (P560)</sup>。第一，人是一种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有机生命体。在进化过程中，直立行走标志类人猿迈出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脚分工与手的解放不仅使手兼有劳动产物和劳动器官的双重特性，更使手作为整个机体的一个肢体，能够对机体其余部分进行直接的反作用。例如，手的解放间接推动语言的产生，也促进人脑以及感觉器官、听觉器官等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第二，自然条件在类人猿进化为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恩格斯指出，“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过渡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向人转变的重要一步”<sup>[4] (P556)</sup>，特别是，自然界的肉类食物中富含满足脑本身发展所必需的营养物质，使脑结构在代际传承中得以更完善地发育。但由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人本身”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不

同于其他生命体受制于特定天然环境的束缚，人的生存活动向整个自然界开放，这赋予人的对象世界以无限的丰富性。

其次，“人本身”表明劳动的具体创造对象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由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人的生命存在超越了动物式生命存在的狭隘性和贫乏性，在人与自然的生成性关系中呈现全面丰富性和自由开放性。具言之，第一，劳动赋予人以超越动物式“种”属性的独特“类”特性。“正如人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sup>[4] (P557)</sup>第二，从事劳动活动表明，人不是如普通动物般的“既成式”存在者，而是一种具有历史生成意义的存在者。“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sup>[4] (P559)</sup>第三，人的意识使人超越了自然生命的被动性和封闭性，实现自然生命和超自然的类生命的统一。“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sup>[4] (P560)</sup>

最后，“人本身”标识劳动所指涉的具体创造对象是一种社会存在物。由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从事对象性活动的人在根本上具有社会性质。动物式的“群聚”活动是为应对环境挑战且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所形成的。而人的劳动活动不仅打破了个体彼此之间的封闭性和隔离性，还要求个体在对对象世界的共同创造和占有中，与他人形成一体性的共同体关系，并鼓励个体运用共同的社会力量获得和生成自身的自主性。具言之，第一，劳动使人们集聚在一起，促进个体与他人构建社会关系，从而使人成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正如《作用》中指出的：“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sup>[4] (P555)</sup>第二，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能够从事各式社会活动，并且可以学会认识和控制生产行为造成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在社会领域中，“我们……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sup>[4] (P561)</sup>。第三，变革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推动人类社会共同体获得解放的现实基础。“只有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使得生产的目的回归到人，使社会关系改变了类似动物界的生存竞争状态，才能在解决人与人的矛盾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sup>[11]</sup>所以，要控制以私有制为根源的社会后果，“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sup>[4] (P561)</sup>。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人本身”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人，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人”，而是富含自然属性、类本质和社会性整体意蕴的劳动存在者。这使得“人本身”与生物进化思想中的“动物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存在本质区别。在“动物人”假设中，人所生存的外部世界具有极其森严的生态链结构，生活世界遵循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则；在“经济人”假设中，人是一种不择手段地争取自我最大利益的原子式个体。“动物人”与“经济人”假设在根本上都是具有狭隘性和私利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动物人”假设用人生存的动物本性湮灭了人生存的文化规定性和丰富性，“经济人”假设用人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性排斥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和谐共生性。

总之，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出发，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层面理解“人本身”生成状态，可以发现，“人本身”是富含自然性、类本质和社会性整体意蕴的劳动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方式，同时也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创造出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因，“更是人类历史演化历程的历史原点，是人类历史画卷的第一笔”<sup>[5]</sup>。“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蕴含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智慧，其所考究的并不是人类的生物学起源，而是借助从猿到人进化过程的历史发生学考察，

确证生存论视域下人的独特存在方式，进而阐明：作为感性对象性的“劳动”构成了“人本身”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第一个生存要件。

### 三、“劳动”之于“人本身”的“创造”关系能否颠倒？

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还是“人本身创造了劳动”？这是探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第三个基础性问题。“人本身创造了劳动”的提出者认为，“光有劳动没有劳动主体，也是创造不出什么人的。只是劳动的主体，也就是人类的祖先充分发挥了他的潜能——实际上是高度的智能，人才得以诞生……也就是人具有发达的自觉能动性，这样才能使劳动本身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也创造了劳动本身”<sup>[12]</sup>。具体来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人创造了劳动”的具体内涵指向不同，因而必须对这两个命题加以辩证解读，挖掘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侧重点。

从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视角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表明，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在创造具有自然属性、类本质和社会性的“人本身”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人创造了劳动”则指的是，如果没有作为劳动主体的人，那么一种有别于动物本能劳动的自觉能动性的劳动便不存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人创造了劳动”的共同根基在于“人本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人本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在生命意义上的共生关系；二是人与自然在生活意义上的共荣关系。

在“人与自然在生命意义上的共生关系”层面，自然环境作为人的生命存在条件，对人的活动发挥直接制约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中，自然界固然是受人能动改造的自然客体，但它作为人的生存活动自然条件的意义更加重大。这是因为，自然界不仅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性泉源，更赋予了人类生命以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等丰富的内在属性。人类通过进化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持续不断地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都必然是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其结果是形成了不断拓展并且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环境。这种共生关系表明，人与自然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本身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躯体”。所以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绝不能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sup>[4] (P560)</sup>。

在“人与自然在生活意义上的共荣关系”层面，人本身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独特生命体而存在，而自然本身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被人化着。人的劳动实践不仅造就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的人，也造就了属人的自然环境。自然的历史表明，自然界不仅是人类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资料的直接来源，而且是人类一切财富的必要源泉。“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sup>[4] (P550)</sup>这种共荣关系表明，一方面，自然界必须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即成为人本身的无机身体。人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虽然是从自然界中孕育而出，但自然界并不是直接同人相适合地存在着。经由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自然界才对人构成一种对象性关系。另一方面，人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劳动也在不断实现自然化。人直接说来就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通过感性与对象性活动去确证自己独特生命价值的自然存在物。但人的活动不仅不能脱离自然界，反而必须参与进“自然界的生活”<sup>[6] (P210)</sup>。因此，“正是有了创造‘现实的个人’的劳动（生产），人类历史才不至于被自然的历史所填平，才能开始真正的人类史；同时，人的劳动（生产）及其社会化形式又离不开自然界，人类史又是以自然史作为前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统一的内在思想根基”<sup>[13]</sup>。

但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人创造了劳动”在生命层面和生活层面又存在根本差异。从生存论的生命性维度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表明,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发挥“中介性”的创造作用。而“人创造了劳动”则指出劳动作为一种人的生命活动的表征。从生存论的生活性维度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表明,劳动帮助人明确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历史地位、自身生存与一般自在存在物之间的关联,加深了人对自身生存能力及其发展潜力的自我认知。“人创造了劳动”则表明,是“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丰富劳动形式、升级劳动工具、改进劳动技术,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让“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式。

首先,从生存论的生命性维度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人创造了劳动”两个命题在不同方面标定了劳动的属性与功能。“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论断,展现的是劳动的对象性特征和人的历史生成性特质。从人、动物与自然的关系看,动物与自然之间是一种适应性关系,自然是动物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外在力量。与此不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从原始的和谐、现代的分裂到共产主义的和解。其中,劳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原始的和谐阶段,人的劳动能力仍待加强,因而人对自然充满崇拜。自然表现为一个富含灵性的整体并接受人的敬拜,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中。随着人的劳动能力的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改变。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大工业标志人的劳动能力的跃升,但这一阶段的异化劳动却摧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让神秘的自然界沦为服务于人的需要的单纯有用物。与此同时,这种“现代的分裂”还表现为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对此,恩格斯告诫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4]</sup>(P559-560)。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变状态,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6]</sup>(P185)。

与之相反,“人创造了劳动”则指出劳动作为一种人的生命性活动,其丰富性正是人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正是随着人的内在生命活动的不断发展,劳动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形式”变成“属人的能动形式”,从动物的偶然性活动变为现实人的必然性活动。在福斯特看来,恩格斯“辩证的自然主义”表现为他“揭示了人类史前的发展,使得文化上的共同进化可以被辩证地看作来源于物质的劳动过程,由此人类通过制造工具和生产来改变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以满足其生存需要”<sup>[14]</sup>(P235)。即是说,劳动的生成、存在与发展都是符合并满足于人的日益丰富的生命活动要求,整个劳动进程同时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客观对象的属人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从这一视角看,劳动具体承载和表现着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探讨自然与人的关系意味着,我们不是把自然视作纯粹的物质实体,把人视作具有封闭意识结构的精神实体,进而运用逻辑范畴搭建自然与人之间的“僵死”的概念桥梁;相反,“生存实践活动通过把人的生命力量对象化,把自然界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把自然关系变换为‘属人关系’,从而使整个世界‘活化’起来并拥有了生命的光辉”<sup>[15]</sup>。

其次,从生存论的生活性维度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人创造了劳动”两个命题在不同方面标定了“创造”的含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之“创造”,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具有“自我创生”性质的“生产”活动。人的生存活动是人的生命在周围世界中的表现和体验活动,“是人有意地、主动地进行的‘生产性’与‘再生产性’活动”<sup>[16]</sup>,而这同时也就是人的生活活动。这表明,在推进人的生成过程中,劳动发挥本原意义上的创生功能。依凭劳动,人明确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历史地位、自身生存与一般自在存在物之间的关联,加深了人对自身生存能力及其发展潜力的自我认知。

而“人创造了劳动”之“创造”,则更侧重于一种带有创造者思想意图的目的性活动,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智力内容。人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让“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

式。纵观人类劳动史，从劳动的类型学视角看，劳动形态“从最初的采集、打猎和农耕转向手工制造、工厂生产、服务生产，再到以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生产和数字生产”<sup>[17]</sup>。前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劳动生产规模相对狭小且分散，生产工具简陋且更新较为缓慢。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劳动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被严格组织起来的有纪律约束的活动；机器取代了简单生产工具并成为人的器官投射，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但严格的工厂生产纪律、劳工监督制度与奖惩考核制度使“刑罚的‘监狱——形式’对应着劳动的‘工资——形式’”<sup>[18] (P243)</sup>。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的发展，数字劳动逐渐成为人类的新兴劳动形态。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场域与时间的移动化的特点，使“劳动与休闲的界限模糊化”<sup>[19]</sup>。从劳动的社会发展论视角来看，劳动形态演变历经私有制社会阶段的奴役劳动、谋生劳动、公有制社会阶段的体面劳动，最终将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人类最早的劳动主要是奴役劳动，从自然奴役到社会奴役和自我奴役，束缚了人的身心自由。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谋生劳动阶段，人们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来维系自己的生活。当社会进步到一定阶段，在生存由社会负责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加体面而劳动，从而进入体面劳动时代。在这个阶段，劳动不主要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提高自身的尊严和体面。在最后的自由劳动阶段，由于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时间和休闲自由时间完全重合，劳动成为没有任何内外部压力的“生活的第一需要”<sup>[20] (P435)</sup>。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人创造了劳动”均以“人本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为共同根基，蕴含了“人与自然在生命意义上构成共生关系、在生活意义上构成共荣关系”的生存论意蕴，但二者在生命层面和生活层面也存在内涵的根本差异。立足生存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类历史视作受自然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所共同界限、制约的人类活动过程，则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也就必然地要从对两种必然性的扬弃及其关系入手”<sup>[21] (P310-311)</sup>。因此，“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人创造了劳动”两种论断既包含了在把握“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性’作用”的基础上，着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意蕴；同时也启示我们应关注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劳动状态，逐渐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异化状态，使人在劳动中能够实现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统一。

#### 四、结 语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生存论意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生存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根基看，劳动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其“中介性”特征和功能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生成性关系，即人在劳动活动中不断建构自身存在意义、塑造社会关系并实现与自然相统一；第二，从生存论对人独特生存方式的考察视角看，由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在人与世界的生成性关系中，劳动确证了“人是富含自然性、类本质和社会性整体意蕴的劳动存在者”，也构成了人类从自然界中创造出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因；第三，从生存论的意义指向看，自然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物质前提，同时人类也在彼此交往中以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丰富自然本身，自然与人类社会共同组成属人的“生活世界”。在人的生命存在与生活世界的相通性中，劳动之“创造”的具体意涵得到真正彰显，人与自然在生命意义上的共生关系、在生活意义上的共荣关系也得以展现。

在理论意义方面，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解读“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经典论断，能够超越单纯生物进化学的解释，发掘作为人基本生存方式的“劳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出现实自然界的人化本质和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状态，最终确立外部世界的属人意义，进而确立属人世界在人的生存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为理解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角,一定程度为破解学界的代表性论争提供了全新阐释思路。在现实意义方面,“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论断的出发点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关系。这种关系原初是由劳动实践活动确定的,又在劳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对于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及新时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劳动与自然实现互动的人,是富含自然属性、类本质和社会性整体意蕴的劳动存在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应关注人的劳动体验与生存状态,通过扬弃根植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坚守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形式,逐步探索破解人与自然之间劳动异化的行动方案,使人在劳动中实现生命和生活的统一。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在生命意义上构成共生关系、在生活意义上构成共荣关系,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及其满足过程始终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塑造的过程。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应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和长远利益作为行动指南,“在人的活动与自然界之间建构起和谐的物质变换关系”“超越资本加速扩张所锻造的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sup>[22]</sup>,积极探索统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发展模式,“强化产业集群化、协同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完善生态标准助推产业升级”<sup>[23]</sup>,以“重视自然财富与人本价值”<sup>[24]</sup>的理念为重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参考文献

- [1] 李珍.“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新论[J].广东社会科学,2024(1).
- [2] 刘福森.从本体论到生存论——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
- [3] 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1).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张严.“劳动创造人本身”命题的再考察——重读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J].理论视野,2020(1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曹孟勤.对劳动的第一哲学思考——兼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J].学术研究,2022(6).
- [8] 王南湜.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新解——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阐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
- [9] 黄湛,李海涛.“劳动创造了人”:对恩格斯原创思想的误读和曲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6).
- [10] 杭州.拉马克式还是达尔文式?——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思想哲学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8).
- [11] 丁晓强.恩格斯以劳动为中心思想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和现实意义[J].湖湘论坛,2020(5).
- [12] 周国兴.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劳动?——与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对话录[J].思想政治课教学,1989(6).
- [13] 吕世荣,刘旸.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命题的哲学意义[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 [14]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15]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 [16] 郝栋,董子钰.“生命共同体”要素构成视角下马克思生态观点的中国化发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
- [17] 丁述磊,戚聿东,刘翠花,等.劳动形态演进、人机关系变革与劳动关系重构[J].经济学家,2024(4).

- [18][法]米歇尔·福柯. 惩罚的社会[M]. 陈雪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19]冯莉, 张韦恺. 数字劳动新形态与新型数字劳动关系的构建[J]. 江苏社会科学, 2025(1).
-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1]王南湜. 人类活动论: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22]洪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角[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3).
- [23]郎慧慧. 论新质生产力的大生态观[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 [24]郭飞, 方伟.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唯物史观阐释[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 An 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Labour Creates Man Himself”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XU Nuo-zhou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lassic assertion that “labour creates man himself” does not indicate Engels’ intention to solve the mystery of the origin of human beings in a biological sense, but rather aims to emphasize that “labour is the first basic element in the creation of social life”, which implies Engels’ existential wisdom in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n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manner. Labour as an “object activ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structu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enabling “man himself” to be generated and made into “man himself” in interaction with nature. In this sense, “man himself” is not a transitional creature between ape and man, but a total being that combines natural, analogical, and social qualities. Although “labour creates man himself” and “man creates labour” share the common foundation of “the oneness of man and nature”,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istential dimension of life and the dimension of living. The meaning of the existentialism of “labour creates man himself” is revealed by taking labour as man’s basic means of existence, establishing the pers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n establishing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personal world in man’s existence.

**Key words:** existent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bour; man and nature

(责任编辑 孙洁)